

日本の国際政治学

日本国际政治学

· 第三卷 ·

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 /编

〔日〕国分良成 酒井启子 远藤贡 /主编

刘 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序 章 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 国分良成 / 1

引 言 / 1

一、地区研究的概念与轨迹——美国与日本 / 3

二、全球化时代的地区研究 / 12

三、本卷的目的 / 16

第一章 国家与民族主义 竹中千春 / 19

一、国家与民族主义之间 / 19

二、21 世纪的新现象 / 20

三、民族主义的革命 / 23

四、19 世纪的国际政治——从“革命的时代”到

“新势力均衡” / 26

五、20 世纪前半期的国际政治——总体战、俄国革命、

法西斯主义 / 28

六、20 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政治——冷战体制与

去殖民地化 / 32

七、“最低限度的道德”——来自地区研究的创造性批判 / 35

第二章 冲突的理论与现实——从地区角度对武装冲突的观察

武内进一 / 38

引言——从地区观察武装冲突 / 38

一、现代冲突及其原因 / 39

二、武装冲突的地区比较 / 43

三、决定冲突特性的因素 / 48

结 语 / 53

第三章 地区主义的经验与课题——欧洲视角 森井裕一 / 55

引 言 / 55

一、“地区主义”“综合研究”与“欧盟研究” / 56

二、从《欧洲宪法条约》受挫到《里斯本条约》 / 60

三、《里斯本条约》后的课题 / 65

结 语 / 71

第四章 中国与国际政治——中国与全球化的交错

小嶋华津子 / 73

引 言 / 73

一、激进主义的中国 / 74

二、现实主义的中国 / 76

三、新自由主义的中国 / 79

四、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中国 / 84

结 语 / 87

第五章 东盟共同体与新加坡 田村庆子 / 89

引 言 / 89

一、对新加坡而言的东盟 / 90

二、东盟共同体的理念与新加坡的现实 / 95

三、新加坡推动与东盟外的交流 / 103

结 语 / 105

第六章 中东的国际政治——由他者决定的地区与冲突

酒井启子 / 107

一、“中东”地区概念的国际政治性 / 107

二、日本的中东地区研究谱系 / 109

三、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背离 / 110

四、中东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联动性 / 112

五、地区内国家间关系调整的缺失与“新战争” / 119

结 语 / 123

第七章 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与宗教 小杉泰 / 124

一、伊斯兰的政治复兴 / 124

二、世界性的宗教复兴 / 130

三、有可能建立宗教复兴的国际政治学吗？ / 135

第八章 非洲与国际政治——国家的变动及其国境 远藤贡 / 141

一、非洲与国际政治——“自下而上视角”的问题 / 141

二、受到质疑的国家——冷战后非洲国家变动的
形态及其解释 / 146

三、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与主权的现代课题 / 151

结 语 / 154

第九章 拉丁美洲——双重转型的国际政治学 出冈直也 / 156

引 言 / 156

一、拉丁美洲的“双重转型” / 157

二、对“左派失败”的“阴谋论”解释 / 160

三、对“阴谋论”解释的批判 / 165

四、军事背景的重要性 / 166

结 语 / 170

第十章 中域欧亚大陆——寻求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岩下明裕 / 174

一、新秩序形成期的欧亚大陆 / 174

二、如何看待中域欧亚大陆的政治 / 178

三、中亚——欧亚大陆的试金石 / 182

四、“9·11”之后——重现“大博弈”？ / 185

结 语——中域欧亚大陆的秩序形成 / 189

第十一章 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 久保文明 / 192

引 言 / 192

一、本章分类的理由与意义 / 194

二、民主党各势力与外交政策 / 196

三、共和党系势力与外交政策 / 198

四、与 2008 年总统选举的关系 / 203

结 语 / 208

参考文献 / 209

序 章 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

国分良成*

引 言

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近亲还是远亲？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可以说，两者因为都关注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具有某种血缘关系，但其产生与发展途径却各不相同。地区研究主要关心对某个特定国家及地区内在背景的解析，而国际政治学则关心对国家、地区间的关系等外在背景的解析。也就是说，两者既是近亲也是远亲，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本章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回顾美国与日本地区研究的概念、产生及其扎根的过程，明确两国的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将论及传统型的地区研究在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动中，正被迫转型为全球性的地区研究。

目前，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根据会员的专业分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史与国际政治史、地区研究、新领域与新课题跨学科研究等四个领域（参照 2008 年版会员名册）。学会在草创期则按序分为外交史与国际政治史研究、地区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日本国际政治学会〔1979〕）。其后则按序排列为国际政治学、外交史与国际政

* 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部长，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委员长。

治史、地区研究（石川、大芝〔1992〕）。这是由于近年来以往的分
类已无法适应时代要求，并出现了新的学术领域，于是才分为以上
四类的。

学会的这一历史告诉我们，外交史与国际政治史以及地区研究
在学会中始终保持其地位，但同时随着时代变化，其优先顺序也逐
步让位于理论及新研究领域，而本章选取的就是其中的地区研究领
域。可以看到，地区研究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中尽管排在国际政治史
与外交史之后，却始终确保着稳定的地位，直至今日这也没有任何
改变。根据石川一雄与大芝亮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的日本学者问卷调查进行的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最为优秀、得
到评价最高的就是地区研究（39.2%，历史研究 37.3%，理论研究
6.4%）（石川、大芝〔1992〕283）。

但是，如果观察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的各个分会，就会发现其分类项目中几乎
没有地区研究。此外，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及国际关系论的教材中也
几乎没有地区研究这一项。为何日美之间会出现这种差异？另外，
如今在日本，国际关系论与地区研究如同兄弟关系，很多情况下这
两者在大学本科与研究生课程中都属于颇受欢迎的专业。但是，美
国却不尽相同。在美国，与国际关系论及国际政治学相比，地区研
究与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的关系更密切，现在理论取向较为薄弱的
地区研究在全球化的潮流下明显呈衰退趋势。为何日美之间会出现
各种差异？本章首先带着这一问题回顾地区研究的历史，并明确日
美在地区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差异。

本章另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关于地区研究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在
日本，地区研究的确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知^①。但是，并不是

① 最近地区研究确保了作为日本学术会议中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地位，也成为日本学
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的资助领域之一。有关近年来日本地区研究确立为一个学科的详细情
况，可参考提交日本学术会议的下述建议书。http://www.scj.go.jp/ja/info/kohyo/17htm/17_43.html。

因为这样地区研究的地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传统上占主流的埋头于某地区的研究风格已无法充分适应全球化及地区主义风起云涌的21世纪。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最近对国际政治学本身仍未摆脱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单位的传统认识框架的批判之中。人们日益认识到,原本地区研究就是作为对欧美发展而来的各种理论的质疑或反论,尤其在日本更是如此。对以往的理论提出批判固然可喜,但也有必要自觉意识到从批评中如何发掘新的视角。

一、地区研究的概念与轨迹——美国与日本

“地区研究”的概念

“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存在着各种定义。笔者希望将其定义为“发现并解析世界各地个性的知识探求”。关于地区研究的基本概念,从过去到现在,无论是地区研究的发源地美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大的差异。一般而言,地区研究指的是对世界某个特定地区进行实证研究,以解析其个性。为此,首先要学习这个地区的语言,通过实地研究及共同研究对地区个性进行跨学科性的探究,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认知的作为地区研究精髓的基本内容。

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着一种批评,认为地区研究与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物理学、医学等传统学术体系建立的领域不同,不是“学科”而只是研究的“方法论”。虽然地区研究在日本似乎已经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但这一点恐怕也将是今后地区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

在地区研究发源地美国出版的对地区研究草创期状况的研究报告的序言中,世界地区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温德尔·贝内特(Wendell Bennett)对地区研究进行了如下定位:“学科与地区专业领域是长期争论的课题。传统的学科已经在我们的学术机构中得到确立。而其中的一部分则是有关地区的更细微的领域及专业,这些一般会被视

为某个主题的次元性研究。因此，地区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Hall [1947] iii）。该报告的主编罗伯特·霍尔（Robert B. Hall）则将地区研究的目标与方向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①全面的世界知识；②共同调查及知识整合；③理解比较文化；④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难题。这为地区研究如何克服学术地位低于既存学科指明了方向（Hall [1947] 46-50）。

在这份报告约30年后的1975年，出版了在当时日本地区研究学者间也风靡一时的论文集《政治学与地区研究——竞争对手还是伙伴》。论文集的序言中主编白鲁恂（Lucian W. Pye）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近年的学术界中，外国地区研究的推动者与试图捍卫传统学科优势的人之间潜存着相当紧张的关系。……从学科的角度看，强调特定地区及国家特性及特征的学者与关心普遍性理论发展的学者之间存在着对立”（Pye [1975] vii）。这一点从美国政治学会季刊*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偶尔出版的有关政治学与地区研究关系的特辑中也可发现，传统学科及理论与地区研究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近年来也并未解决（APSA [1997] [2001]）。但是从本章的出发点看，颇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地区研究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虽然存在着很多争议，但与国际关系论及国际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却鲜有争论。

日本的地区研究是二战后从美国引进的。当初，日本的地区研究概念自然带有舶来品的强烈倾向，近乎忠实地照搬美国。参与了采用美国式地区研究模式的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工作的农业经济学者本冈武在考察美国后，将地区研究的特征归纳为以下七点：①研究和教学的组织一体化；②跨部门的综合研究组织；③重视对现代的研究；④强调语言教育；⑤尊重学科教育；⑥现场调研的必要性；⑦文献资料的配备（本冈 [1963] 5-19）。

其后，特别是以人类学学者为中心，展开了对地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论的大辩论，而最近对其概念的规定正在逐步形成“最大公

约数”。立本成文将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的立场分为两种，一种是只将地区作为信息搜集分析的场所，将地区的特定现象选定为研究对象，参考现有学科的方法论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一种是追求对地区的理解与综合描绘以确立新的地区研究方法（立本〔2001〕317-319）。立本进而将这种地区研究归纳为三个特点：①作为研究对象的地区性；②作为研究方法的综合性；③作为研究目的的现代性（立本〔2001〕320-329）。

重视对地区的理解，还是重视学科性，这种传统上的对立在美国也同样存在，而跨学科、综合理解地区的意向也基本相同。但在美国，存在着地区研究被定位于学科之下的默契的同时，也有地区研究成为促动学科活性化媒介的强烈期待。如后所述，与美国相比，日本的地区研究存在着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地区研究的立场出发，对欧美理论与模型进行批判、否定的方法论倾向。此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所谓的“国际化”期间，地区研究最终目标中综合理解现代世界的侧面日益增加，这种倾向本身就表明了地区研究大有跻身于既存学科的势头。这就是说，地区研究在日本并没有被定位于学科之下，而地区研究在理解现代社会发挥着部分基础性的作用，实际上也进一步产生了缩短与国际政治学及国际关系论距离的效果。

美国地区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地区研究的起源较为复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了了解分析战时情况的产物。根据战后不久总结这一诞生过程的上述霍尔的报告：“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需要大量有关各种场合的准确情报”，“为了迎接总体战的到来，军方认识到有必要获取相关地区的知识，于是向各个大学分配了地区及语言的培训计划”（Hall〔1947〕1）。1943年美国的社会科学评议会提交了题为《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地区》（Hall〔1947〕2-3）的报告，指出为使地区研究人才辈出，有必要制定有关地区研究的人才培养计划。1943年，美国

成立了全美第一个地区研究的学会——远东学会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1956 年改称亚洲学会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Waters [2000] 100)。至今仍被奉为日本人研究的经典之作、文化人类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Benedict [1946])，就是从未到过日本的她在对日战争的末期受战时情报局之托，为了解析敌对国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习惯及模式，根据文献资料与采访调查在短期内写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拉开了美苏冷战时代的序幕。随着冷战的加剧，刚刚诞生的地区研究也随着其母体美国的世界战略开始成长。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等财团开始迅速向全美国的主要大学提供用于地区研究的资金。哈佛、哥伦比亚、耶鲁等各大大学在战后很快成立了旨在进行俄罗斯研究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 (Waters [2000] 100)。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应急之策，各主要大学在这些财团的资助下又建立了中国研究及远东研究的研究机构。其后，有关欧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地区研究机构也伴随着美国霸权时代的到来应运而生。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这一倾向更加明显，特别是在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及洲际弹道导弹 (ICBM) 的巨大冲击下，美国在国防与教育领域相继完成多项立法 (Waters [2000] 69)。换言之，将地区研究作为战略后方的色彩极为浓厚。也就是说，地区研究的定位是有关冷战体系下潜在敌国与盟国的知识积累，或者是对这些国家运作方法的摸索 (Mirsepassi, et al. [2003] 3-4)。就这样，在冷战时期，各个财团的支持加速了地区研究的发展。^① 1950 年到 1973 年，仅福特财团就向以地区研究为中心的国际问题研究资助了 2.78 亿美元。其中 3700 万美元用于亚洲研究；3100 万美元用

^① Cumings [1997] 的研究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各财团对地区研究的支持，其背后存在着强烈的政治介入。

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研究；1300 万美元用于非洲、中东研究；1100 万美元用于拉丁美洲研究。如果考虑到当时美元的强势地位，这些金额在今天可谓天文数字了。而福特财团还在 1952 年设立了外国地区奖学金计划，从 1952 年至 1972 年共资助了 2050 名学者，其中历史学 605 人、政治学 439 人（Pye [1975] 11-12）。在冷战的政治背景下，资助地区研究的中心是历史学和政治学。

由此可见，美国的地区研究产生于现实政治，并在政治中不断成长。但是，地区研究的种子一旦发芽，就逐渐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萌生了作为学科的自觉性与自立性。与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相比，地区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亲和性日益加强。这或许是由于地区研究大多涉及非欧美国家，且与美国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密切相关，因此在其根源深处存在着掌握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现状与方向，并尽可能诱导这些国家走上成为美国式社会民族国家发展轨道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地区研究具有“社会科学的优良数据库”的侧面（猪口 [2007] 215）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说，其位于学科之下的定位已是某种学术界的默契。

美国的这种学术关注促成了成为国家形成中心理论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现代化理论首先在发展经济学中崭露头角。正如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各阶段》一书的英文副标题“一份非共产党宣言”所显示的，现代化理论旨在为新兴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美国式发达大众消费社会过渡提供一条发展路径（Rostow [1960]）。在政治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注，20 世纪 60 年代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地区研究作为政治现代化理论以及较之更为先进的政治发展理论引发了众多的争论。^①

但是，现代化理论不久却成为受到集中批判的对象。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随着越南战争陷入泥潭，反战运动日益高涨。从 60 年

^① 政治现代化理论与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各自的代表作可参见 Apter [1965]，Pye [1966]，Huntington [1968]。

代后期到 70 年代, 现代化理论作为种族中心主义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典型成为批判的对象。1969 年反对越南战争的青年学生们成立了批判以往亚洲研究正统派的“忧虑亚洲研究者委员会”, 他们的批判集中在美国以往的亚洲研究变成了战争与侵略的工具, 而现代化理论则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 结果无法解决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①(金原 [2000])。

在上述背景下, 现代化理论急速走上了下坡路, 同时越南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停滞和美元暴跌, 美国对地区研究的关心开始迅速下降, 这一现象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到 80 年代以后最为明显。代表这种氛围的就是保罗·柯文 (Paul A. Cohen) 对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性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知识帝国主义》(Cohen [1984]) 一书。如后所述, 1989 年冷战结束, 进入 90 年代后, 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其后美国的关注内向性倾向进一步加强, 地区研究也失去了再次拥有 20 世纪 50—60 年代黄金期那样的活力。当然, 与反恐及伊拉克战争有关的中东、中亚以及与崛起的中国相关的地区研究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就全体而言, 似乎可以认为地区研究已经被排除在学术界重点项目之外。

日本的地区研究——从进口到本土学科

如果考虑到语言学习、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共同研究等地区研究的基本要素, 地区研究的名称虽然发源于美国, 但具备地区研究要素的研究方法却存在于古今东西的历史之中。任达 (Douglas R. Reynolds) 在考察二战前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后认为, 该书院是领先于美国地区研究的典型 (Reynolds [1986])。日本在二战

^① 关心亚洲研究者委员会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 比起研究中心, 更可称之为政治性极强的运动组织。站在亚洲的立场上从事研究的姿态固然值得肯定, 但诸如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肆意赞美等的研究, 其后委员会也不断被这种政治性所嘲弄。

前为经营大陆而组建的大型智库满铁调查部也可称为一种地区研究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在二战后都被作为战前军国主义的情报机关而被否定并解散。当然,战后的这种否定不仅针对上述研究,更是针对战前日本的学科体系本身。

在战后知识真空的状况中,日本的学科体系极大地依存于美国(Eto [1961] 129)。战后,从战场回到大学的一部分优秀年轻学人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美国,被与日本大相径庭的美国知识环境所震惊和折服,并努力从中摄取营养。他们回国后,开始向日本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传递美国式的学术风格。地区研究也是其中之一。以庆应义塾大学为例,政治学科“地区圈研究”讲座就是石川忠雄在美国亲身经历了当时极为兴盛的地区研究并于1957年回国后马上开设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美国学会成立于尚处于美军占领下的1947年^①;亚洲政经学会成立于《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的1953年;而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则成立于1956年。这些都象征着战后日本开始再次启航走向世界。

美国式的地区研究在日本得到了迅速传播。1955年北海道大学成立了斯拉夫研究中心;1958年亚洲经济研究所、同志社大学美国研究所相继成立;1959年成立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从“美国式”的角度看,1963年在福特财团资助下成立的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十分重要。该研究中心旨在从事以“东南亚现代化”为中心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在实施包括实地调查在内的调查研究计划的同时,还包括实施以培养研究人员赴当地进行以语言学习为中心的地区研究培训计划(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63])。

值得深思的是,地区研究草创期的日本研究者们有意识地极力

^① 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以美国研究为开端是很自然的。战后,日本被以前的敌国美国占领统治,而美国也极力寻求加深对美国的理解。美国学会的创建既是如此,1950年起东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合办的美国研究研讨班开始活动,第二年京都美国研究研讨班开始活动(斋藤[1998])。

排斥美国地区研究中明显存在的政治性。亚洲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东畑精一在所刊《亚洲经济》创刊词中表示：“除了历史方面之外，我国过去很多有关亚洲的研究及调查几乎都是出自‘国策’的考虑。……这其中的研究多以单纯的一时性的或偏袒日本的‘利益论’而告终。……亚洲经济研究所将不断对此进行反省，并始终坚持真挚的研究活动”（东畑 [1960] 4-5）。

此外，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之际，京都大学校长平泽兴曾发出忠告：“在有关东南亚研究的问题上，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一研究归根结底只能着眼于对该地区进行科学研究，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政治性立场”（平泽 [1963]）。上述发言都抱有对战前日本与亚洲之间不幸关系的强烈意识，象征着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氛围，可谓意味深长。尽管地区研究是从美国引进的，但非政治化是其研究前提这一点在日本得到了普遍认同，这反映了时代的大气候。

日本的地区研究尤其是政治学研究，还有一点与美国存在着明显不同。美国的地区研究由于以政治学学科的优势为前提且是视为对其进行补充而建立的，因此与政治现代化理论及政治发展理论等比较政治学较为接近。而日本则在政治学方面的理论化意向较弱，较之现代化理论等方法，对传统的实证、历史分析的重视意向较强，莫如说与国际政治史及国际关系论的关系更为紧密。此外，日本的地区研究存在着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研究同义语的强烈倾向，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欧美发展的政治理论及比较政治学与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如何不同。总而言之，日本地区研究有这样一种强烈倾向，其存在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强调以往起源于欧美的理论不足。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美元地位的迅速下降及日元地位的迅速上升，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被迫向海外发展。而来到日本的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留学生急剧增加，单纯的劳

工也开始大量流入日本。这个时代在日本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国际化”，日本人在海外的生活状况以及日本社会如何应对来日外国人等，都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在崛起的日本的“国际化”推动下，对地区研究、国际关系教育等的需求也迅速扩大（上智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1984〕序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取代在越南战争中疲惫不堪的美国，在国际上的存在感不断上升，世界上探求战后实现了经济奇迹的日本之力量源泉的地区研究也风靡一时。^① 作为对这种现实动向的反映，地区研究及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相继建立，相关的研究项目也大幅增加^②。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学科中都出现了与地区研究及国际关系相关名称的课程。

在上述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论的距离日益拉近。坦率地说，这并不一定是充分考虑到地区研究中重视历史文化特殊性及地区固有内在因素的倾向与国际关系重视和其他国家及地区之关系及外在因素的倾向这两者之间方向性差异的结果^③，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在于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尽管如此，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成功的，双方以和平共处的形式带来了相乘效果。

① 比如可参考 Vogel〔1979〕、Johnson〔1982〕等。

② 这时成立的研究机构有成蹊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81年）、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1981年）及亚洲文化研究所（1982年）、庆应义塾大学地区研究中心（1984年）、国际大学日美研究所（1985年）、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日本国际论坛（1987年）、世界和平研究所（1988年）、立命馆大学国际地区研究所（1988年）、新潟大学环日本海研究所（1988年）、国际东亚研究中心（1989年）等。

③ 过去的亚洲政经学会中，曾对包括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论的关系在内的日本地区研究进行了激烈讨论。其内容主要刊登在《研讨会“地区研究”的新发展》（《亚洲研究》第28卷第三、四号合刊，1982年1月）。此外，冈部达味就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关系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地区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者，除非是具备特殊的才能，否则恐怕只能是‘进口商’”（冈部〔1992〕ii），对日本政治学中存在的将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翻译为日文并介绍到日本的学术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地区研究究竟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强化做出了多大程度的贡献，仍待商榷。